

(日)西村成雄 著

张学良



遭暗算，东北王命断奉天
谋统一，张少帅东北易帜
主抗日，两将军临潼“兵谏”
被“管束”，张汉公临耄耄之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 著

翻译 史桂芳 李保华 李炳青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字: 01-98-127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学良/ (日) 西村成雄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1

ISBN 7-5004-2376-4

I. 张… II. 西… III. 张学良-人物研究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0532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育仁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375 插页: 2

字数: 154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0.00 元



张学良先生近照



本书作者（右）与张学良先生

中文版序

1995年1月9日，在夏威夷火奴鲁鲁有幸见到了张汉公（张学良）。

年届93岁高龄的张汉公坐在轮椅上，虽然行动有些不便，但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说话充满活力，显得十分健康。我告诉他我是从日本来的，从事中国东北地方史的研究。我先简单地谈了一下看1990年NHK对张先生采访的观后感，接着我们便就他个人的历史体验聊了起来。本想问问那时的具体情况，但是，话匣子一打开，他就根据自己的记忆，栩栩如生地讲了起来，我竟没找到插话的机会，时间就这样慢慢地过去了。其中部分内容，在本书第五章“西安事变”一节中有所论述。

在日中关系史中，没有比与20世纪同在的张汉公更重要的人物了。因为他是20世纪前半期日本侵略中国一个顶峰的“九·一八事变”的直接当事者，又是其后“七·七事变”前夕，使中国政治发生巨大转变的人物。尽管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活动时间不过10年，但这10年却是中国政治的决定关头。面对饱经沧桑的张汉公，作为一名日本历史工作者，我不禁感慨万千。他那恬淡的态度和洋溢着激情的观点，虽历尽磨难，却保持着极为公正的立场，令我深受感动。在与张汉公会面一个星期之后，即1995年1月16日傍晚，在加利福尼亚州住处，通过CNN新闻得知发生了阪神淡路大地震，此后6个小时未与家人取得联系，顿时感到一切都完了，与此相比，联想起张汉公坎坷的经历，更加为他的品格所感动。

本书于 1996 年 3 月,阪神淡路大地震的一年之后完成。这是我本人自 1969 年 1 月撰写《辛亥革命在东北》^{*}(硕士论文)以来的课题,这些年来我经常有意识地收集与张学良有关的资料,其间与中国学者进行了多次的学术交流,尤其 1994 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期间,搜集了很多资料,1995 年在中国的沈阳、长春、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得到了诸多机关和有关部门的帮助,如果没有这些交流,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在此对给予多方帮助的各位先生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最后,对翻译本书的史桂芳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等诸位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马晓光先生、李炳青女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 本论文的译文被《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4 辑转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8 月出版)。

西村成雄

1998 年 6 月 1 日于张汉公 98 岁寿辰之日

译者的话

西村成雄先生是日本著名学者,现任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并兼任我国南京大学客座教授。西村先生多年来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特别是在民国时期政治、东北地方史、中国民族主义等方面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西村先生在研究中,非常注意历史环境与具体事件、人物的联系,并对这些联系进行深刻的剖析,从中发现和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西村先生不仅继承了日本传统史学的实证性研究,充分占有历史资料,而且还特别富于理性思维,研究的角度新、起点高,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观点。如:西村先生在研究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历史时,使用了“国民国家”的概念,认为“国民国家”较一般意义上的近代国家,更强调国民的作用,又如: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的连续性与不连续性的问题,这些对中国现代史研究者颇具启发性,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张学良》一书是西村先生的近著。此书是西村先生二十多年研究成果的总结,为写此书西村先生查阅了大量的中、日、英文资料,并亲赴美国,与张学良先生见了面,与这位世纪老人进行了交谈,虽张学良先生并未直接谈及西安事变,但正如西村先生书中所述,更感到“历史环境”的重大意义。在《张学良》一书中,西村先生对张学良的民族主义作了深刻的分析与研究,并将张学良的民族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爱家、爱国,以及当时中日关系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特别是对张学良的“救国”与“救亡”认同的关系的产生、发展、演变作了深入的研究,是对张学良及西安

事变研究的新突破。因此,我们将该书翻译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

本书各章分工如下:史桂芳序章、第1章、第2章、终章、后记,李炳青第4章,李保华第3章、第5章、第6章。全书最后由史桂芳统一审阅、校订,由于译者水平有限,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在《张学良》一书即将出版之际,对西村成雄先生以及日本岩波书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与协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 者

1998年5月

目 录

中文版序	(1)
------	-----

译者的话	()
------	-----

序 章 世纪老人张学良	(1)
-------------	-----

第一章 20 世纪的东北亚

——日中在“满洲”的角逐	(5)
--------------	-----

1. 与中华世界接轨的“满洲”	(6)
-----------------	-----

2. 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满洲”	(9)
-----------------	-----

3. 中国资本主义在东北的发展	(16)
-----------------	------

4. “满蒙生命线论”的影响	(20)
----------------	------

第二章 建设国家的美好理想

——救国思想体系的凝聚	(23)
-------------	------

1. 张作霖·张学良·郭松龄	(24)
----------------	------

2. 走上“家仇”与“易帜”之路	(29)
------------------	------

3. 张学良主政东北的三年	(33)
---------------	------

4. 张学良政治集团的形成	
---------------	--

——暗杀杨、常 中东路事件	(38)
---------------	------

5. 与蒋介石合作	
-----------	--

——中原大战 进入华北 “九·一八事变”	(45)
----------------------	------

第三章 “九·一八事变”与亡省体验	(52)
-------------------	------

1. “九·一八事变”与国民政府的混乱	(53)
---------------------	------

2. “亡省奴”的认同意识	
——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东北抗日义勇军	(57)
3. 李顿调查团与张学良	(62)
4. “热河失陷”的冲击	(74)

第四章 “旅欧体验”之心路历程

——救亡意识的回归	(79)
1. 张学良的“旅欧时代”	(82)
2. “旅欧体验”后的救国意识	
——国家统一·拥护领袖论	(89)
3. “旅欧体验”后的救亡意识	(96)
4. “救国”与“救亡”的交织	(100)

第五章 西安事变

——张学良认同危机	(104)
1. 1935年11月的危机	(106)
2.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周恩来会谈	(109)
3. 1936年6月22日“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	(116)
4. 1936年12月7日“哭谏”无效	
——蒋介石对张、杨的包围圈	(124)
5. 1936年12月12日“实行兵谏”	
——张学良的认同危机	(132)
6.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为何赴南京?	(139)

第六章 流亡监禁

——如果战后复出	(148)
----------------	-------

1. 军事法庭上的证词与“严加管束”的命令	(150)
2. 10 年的流亡监禁	(155)
 终 章 20 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张学良	
——被日本错误理解的两个凝聚力	(162)
 张学良年表	(171)
附：参考文献	(180)
后 记	(191)

序章 世纪老人张学良

出生于 1875 年的日本人,1945 年恰好 70 岁,此时如果他回忆起 50 年前即 20 岁(1895 年)时的往事,一定会深深地感到日本近代历史的剧烈变动。中国人也会同样深切地感受到历史的激烈震荡。不仅如此,对生活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来说,20 世纪的前 50 年,是在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都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留下集体记忆的年代。

从 1945 年至 1995 年又过了整整 50 年,这半个世纪广泛而剧烈的变化决不亚于前半个世纪。时至今日,日本仍难以摆脱 20 世纪前 50 年历史磁场的巨大影响。现在的日本社会是 1945 年以来的产物,同时也是前半个世纪历史的继续。因此,应审视一下当今日本人的“历史认知”。至少通过这百年的历史,思考一下现在与将来。

在此通过分析至今健在的世纪老人张学良(1901—)的一生,从日本方面重新审视 20 世纪中国的大变动,张学良的人生道路极为典型,是对中国历史产生过极大影响的人物。

张学良曾任沈阳东北大学校长,1928 年秋,他批准了东北大学的校歌。校歌由刘复(字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歌词格调高雅,热情讴歌了白山黑水的东北大地,颂扬三民主义和青天白日旗,主张在东边的日本、北面的苏联的压力下卧薪尝胆,排除空论与狂热,强调知行合一与积学养气。歌词的最后提出通过“爱校、爱乡、爱国、爱人类”,为达到“世界大同的目标”而奋斗,这些内容显然是根植于中国东北大地上的。

这里所说的“爱校、爱乡、爱国、爱人类”或许是一种偶然,但是它体现了中国人对各自社会集团认同的四层构造。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基层的家族、宗族的认同是“爱校”,它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所谓“爱乡”则是对类似血缘的东北地区的认同,它是一种同乡观念,凝聚着东北人的意识。第三层“爱国”则表现了对忠实地继承 1912 年共和国=中华民国的近代国民国家的凝聚力。正如孙中山(孙文)所指出的,这一层认同的凝聚力正在形成的过程中,必须用“国族主义”的水泥来凝固住“一盘散沙”的状态。这就是 20 世纪的中国,为实现国民国家而努力的民族主义。而第四层“爱人类”是关系到世界大同的思想。按照中国人的思路,这也可以说是对“中华民族”意识的认同。如上所述,它构成了包括第三层国民国家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认同的广阔政治空间,意味着中华民国独立时,就开始形成了国民国家(请参考 Lowell Dittmer Samuel S. K im ed.,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张学良在 20 世纪中国的政治空间中,伴随着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形成,曾多次在历史转折关头,戏剧性地发挥了巨大作用,1936 年 12 月 12 日发生的西安事变,使这种作用达到了顶点。在此之前,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也起过独特的作用,从 1928 年 12 月 29 日“易帜”(换上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服从国民政府开始,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后的执行不抵抗政策,就任“剿匪副总司令”等等,都显示出张在中国政治空间的大潮流和转折关头所起到的典型作用。本书重点阐述 1928 年至 1936 年这短短 8 年间张学良和中国政治的特点。

这 8 年是日本与中国关系日益明确的时期,是中国强烈地感受到日本政治、军事压力的时期。在中国的社会空间中,作为近代国民国家,国民政府的凝聚力日益增强,围绕着对日本的军

事侵略，应该采取何种对策，中国社会空间产生了纷繁复杂的矛盾。

然而，从整体来看，日本的侵略，使中国社会空间中逐渐蓄积起民族的危机感和政治的凝聚力，抗日意识产生了抗日政治。其历史的发展恰好直接关系到中国东北地区，张学良起了当事人的作用。1928年的“张作霖被炸事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3年的“热河沦陷”，1935年至1936年的“华北事件”，是日中关系史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对张学良个人来说，与国民政府中央权力的合作，实现了其中国统一的愿望。但是，他同时又面临着现实问题：与国民政府的统一，丧失了自己的政治基础东北（“九·一八事变”），不能采取相应对策，应付以后发生事态的现实问题。这种矛盾随着1935年到1936年日中关系的发展而逐渐开始激化。

也就是说，张学良坚信中国只有向近代国民国家发展，才是防止列强和日本侵略的必由之路。然而，等待近代国民国家的形成，并不能对抗现实的侵略，必须首先组织全民族的不分阶级的各个阶层的抵抗，他开始意识到拯救中华民族这个主题。张学良这位典型的集建设近代国民国家（救国）和救中华民族（救亡）双重课题于一身的政治家，登上了历史舞台。

从张学良个人来看，“救国”的课题是对国民政府及其领导者蒋介石坚定不移的认同，“救亡”是基于自己“亡省亡家体验”（丧失了包括热河省在内的东北四省和自己的家），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恢复国土（东北）的认同。这其中，交错存在着所谓“国民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

这两种认同当初并行不悖，但是随着张学良的“旅欧体验”和其后华北形势的日益恶化，开始出现矛盾，必须决定何者为先，张学良身上便出现了认同危机。张学良人格中已经形成的先

天协调的复合认同在新的条件下开始分解,要重新调整其相互关系,其顶点就是西安事变。

所谓“认同”是指个人与诸集团的心理距离及距离的远近,或者理解为个人复合认同中的矛盾,如 E. H. 埃里克逊所言的认同概念,是从两种精神相互作用的统一中得出的。一个是自身中一直保持的呈现出同样自己和连续性的自我,另一个是在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上,表现为与他人永远共有的某种本质性格。前者涉及个人主体性的确立,是要明确自己为何人的精神上的作用;后者可以说意味着对保证自己身份的集团的归属意识、同一化过程中的精神作用。

谈到张学良的认同,我们试图以其自我连续性,以及对其诸集团的关系为轴心来重新认识,注意到个人的认同与有关文化或集团的共鸣,还有对集团的认同之间相互渗透(请参看:埃里克逊著、小林木启吾译:《自我同一性》,诚信书房,1986年,第10页;马场伸也:《认同的国际政治学》,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序章;栗原彬:《历史与认同》,新曜社,1982年,第一章)。

1995年1月9日,笔者在夏威夷瓦湖岛火奴鲁鲁的威夷肯海边的住宅,见到出生于1901年的93岁的张学良时,切实感到所面对的是20世纪历史人格化的证人、当事者。尽管经历了诸多的人生磨难,但是,在张学良既恬淡又热情的谈话中,自然地显示出了其可贵的人品。诚然,只有这种品格,才能使错综复杂的西安事变得到“解决”。在西安事变爆发即将60周年之际,偶然地在珍珠港,思考一下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与日本,展望今后的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会得到某种启示。

第一章 20 世纪的东北亚

——日中在“满洲”的角逐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东北,对日本来说,是以“国运”相赌之地。其中最富代表性的说法,是 1931 年 1 月 23 日众议院议员松冈洋右(1880~1946),向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提出的质询中谈到的:

“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的生命线(鼓掌),无论在国防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如此……应认识到满蒙实际上是我国的生命线。”

“九·一八事变”后,“满蒙生命线论”进一步渗透到国民的意识中,“保卫满蒙,帝国的生命线”这种蛊惑人心的口号,对动员民众起了巨大的作用。

回顾“九·一八事变”前 20 世纪的日中关系史,日本参加了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译者注)、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战争,当然日俄战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即使到了中华民国时期,日本通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占领了青岛,对中国提出了 21 条,它不承认中国的自律性,致使两国间政治、军事争端不断。

同时,我们也有必要了解 20 世纪史中潜在的亚洲向“国民国家”发展的趋势。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的诞生(1912),就是这股浪潮中的第一朵浪花。尽管它很不成熟,但是,作为具有庞大政治领域清朝的“继承国家”,它是世界国民国家体系的一个成员,而步入国民国家的行列之中。但是战前,日本对中国